

起来，真是汗颜。

伪奉天市长郑禹

国 裕

(一)

郑禹，号炎佐，生于1889年8月8日，是郑孝胥的次子。籍贯福建闽侯。幼年随父郑孝胥、母吴氏及家庭教师习学诵诗，攻读四书五经。1905年5月去日本入东京成城中学读书，翌年4月因做体操折臂退学回国医治，同年7月完婚，8月入上海英华书馆攻读英文，历时3年有余。1910年1月至1911年5月，随上海交通大学英人教授麦秀门补习物理、几何、三角。1911年6月随麦秀门去英国，8月考入利物浦大学士本科。10月，辛亥革命爆发。12月25日，宣统下退位诏，清帝国灭亡。郑禹在英国留学之学费不济，遂于1912年1月退学回国。

1912年7月，郑禹入万国函授学校土木科学习，历时3年。1917年3月在商务印书馆营业部充当印刷营业员。1920年2月调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京华书局协理。1921年2月任经理。1925年6月因与总馆意见合不来辞职。1926年3月任启新洋灰公司上海南部批发所经理。1930年辞职。这时他与李直士筹办的华莹搪瓷公司已经投产。他任常务董事兼管营业。

1931年12月初，郑禹接到郑孝胥从旅顺的来信，叫他立即动身来旅顺。他来到旅顺，郑孝胥向他说：“日本正在与皇上洽谈恢复大清祖业之事。大清复兴在此一举，吾家世代荣蒙皇恩，今须代表宣统皇上与日本方面往商，需要你前来鼎力相助。”郑

禹亦感皇恩浩荡，复辟大清义不容辞，遂满口答应。他到旅顺两三日后即返回上海，把华堂搪瓷公司的股份转让与别人，辞去职务，返回旅顺，帮助郑孝胥为复辟大清奔忙。

郑孝胥任伪满国务院总理，郑禹同他的哥哥郑垂任总理秘书官，成为郑孝胥的左右臂。郑垂掌管翻译和与日本人交涉事宜；郑禹掌管内务。1933年2月14日，郑垂因患猩红热病歿，郑禹肩上的担更重了起来。1934年日本授给郑禹四等瑞宝勋章，以表彰他为日伪效劳有功。1935年5月21日，因郑孝胥念念不忘复辟，对日本有怨言，被赶下了台。日伪为了拢络人心，又赐予他“前官礼遇”。郑禹转任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局长。1938年1月转任伪满洲国国都邮政总局局长。

郑孝胥卸职后，不安于久居伪都新京，朝思暮想返回北京居住，想和他在北京的胞弟郑孝钰及诸亲友共度晚年。1937年8月，郑孝胥得到关东军的许可到北京住了1个月。他很高兴，计划在北京盖一座藏书楼和宅院，准备迁回北京居住。郑禹招用公兴顺营造厂在北京西直门大街修建大屋顶中西合璧的楼房，做为明年郑孝胥迁回北京的新居。

9月，郑孝胥由北京回到新京，情绪甚佳。郑禹积极和关东军联系，说明其父年老怕冷，身体不好，思念亲友，急欲回北京居住。经过反复与关东军协商，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于1938年1月才答复同意郑孝胥去北京定居。郑孝胥欣喜若狂，心早已回到了北京。郑禹将郑孝胥的书籍、大件行李开始向北京陆续发运。不料正当郑孝胥高高兴兴地准备即将去北京定居之时，忽然关东军参谋向郑禹通告说：“你父亲去北平居住的事尚须考虑，暂不要去……。”

郑禹见关东军改变了主意，心里急得火烧火燎，连日来四出奔波频频向关东军恳求念及他父亲年迈体衰去北京心切，经

不起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渴望关东军不要改变原来许诺其父去北京定居的决定。可是无论郑禹怎么苦苦哀求都是徒劳，关东军说什么也不答应。郑孝胥愤懑难消，终日抑郁不乐，导致内热外感，体温急剧升高，经久不降，十二指肠溃疡复发，腹痛，大便变黑不止。郑禹急忙请医买药进行抢救，但是医治无效，郑孝胥于3月18日下午5时病故。

郑禹急觅墓地，托郑孝胥生前的日本朋友太田外世雄前往奉天觅得奉天郊外清东陵东侧奉抚公路旁墓地一处。此地原是日本金刚山佛寺所买，准备修建寺庙，经太田说项，将地让做郑孝胥的墓地。因这块地位置偏于界边，郑禹认为必须把西邻之地再行买入，遂又托太田去沈阳市公署按官价以每亩40元，相当于当地地价的百分之六十强买七八户农民土地50余亩做为墓地，修建陵寝。日伪当局为了安抚人心，为郑孝胥举行国葬。7月3日，举行出殡安葬式。当天下午3时灵柩送到奉天市郊同仕村墓地下葬。

当月，郑禹受命充任伪奉天市市长。这也是郑禹所希望的，因为这样更便于他忙于其父墓地未完之事。当时墓下公路与浑江间有滩地一片约900亩，是官荒。他向伪国务院经济部申请价额，以少许的费用将这边滩地归为郑氏所有，修建陵园。经过修葺，郑孝胥的陵园更加广阔壮观。

(二)

郑禹任伪奉天市市长长达4年有余。这时日本关东军大批要劳工，事先向日本人副市长下达任务，然后由日本人副市长向郑禹转达。郑禹每次都是唯命是从，以市长的名义下达指令，向市内各地要劳工。他曾听说，奉天去的劳工，在修建日军军事工程饶河要塞、虎林要塞完工时，同其他地方的劳工均被集

体屠杀，以防泄密。郑禹听之任之，置若罔闻，不敢向日本关东军提出质询，并接连地下达命令为日军要劳工，按各市区人口数目分摊人数。各市区的劳工大部分是抓来的，因为摊派没人去就抓。当时奉天市先后抓去劳工20余万人。其中1939年在北满军事工程方面劳动的劳工长达两年之久。1941年、1942年郑禹受命向日本、朝鲜送去劳工四五万人，在矿山做苦力。

郑禹在伪奉天市长任内，实行居民口粮统制。日本人吃大米，中国人只准吃粗粮，违者则按经济犯处罪。居民口粮实行配给制，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差，贫苦的市民根本难以填饱肚子。郑禹司空见惯，泰然不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实行统制经济，商店货物很少，没有多少东西可卖。1942年各业主纷纷申请歇业，可是郑禹受命保持市场的虚假繁荣，下令一律不准停止，使商民们叫苦不迭。

奉天市北市场是繁华的商业区，有许多店铺。1940年日本人副市长松田向郑禹说要拓宽改建北市场道路，有五六间房子必须拆掉，政府方面不负责安置，只给少许拆迁费。商民们无路可走，只得选派代表向伪市长郑禹请愿。郑禹秉承日本人的旨意，不顾商民们的死活和巨大的损失，还是照旧全拆除了，对商民们的损失无动于衷，致使商民们哭天喊地，走投无路。

郑禹还以伪奉天市市长的身份兼任伪奉天市协和会常务委员，通过协和会宣传和推行粮食统制配给、国兵、献纳钢铁、出劳工等法令。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军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先后占领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等地，郑禹遵照日本的旨意举行奉天市民庆祝大会。他登台讲演，宣传日本势力如何雄厚，战无不胜；满洲国和日本是亲善不可分的，大东亚圣战必胜，要求全市官民全力支持大东亚圣战等等。

郑禹在伪奉天市长任内，每年9月15日，即出卖东北一切

主权的《日满议定书》签订日，组织并主持青少年学生、职员、工人、市民举行集会游行，进行庆祝。郑禹大讲满洲帝国蒸蒸日上，工农业发达，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绝不能忘记这是大日本帝国的仗义帮助，云云。

由于郑禹对日本帝国主义言听意从，尽心效力，1940年他在伪奉天市长任内被赐授三级景云勋章。

(三)

1942年11月，郑禹充任伪满洲国驻泰国全权公使。日本早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便加紧占领东南亚各国。1941年12月8日零时，日本向它的盟国泰国提出借道泰国境内进攻马来亚。2时，日军在泰国南部登陆。9日，日军占领泰国南部和首都曼谷。1942年9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协商制定《对泰国经济措施纲要》，提出产业“须符合大东亚共荣圈的地区规划”，“工业贸易等均以不违反共荣圈”计划为限。郑禹就是肩负这种使命出使泰国的。他是伪满首任驻泰国全权公使。公使馆参事官是日本人隐岐，一等书记官是日本人上村。郑禹和上村都携带家眷赴任。他们于1942年11月初前往日本候船。12月2日在门司乘白马丸出发，经台湾高雄、澎湖岛，于12月24日始到达曼谷。当时公使馆的主要任务是交换掠夺泰国的物资，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郑禹在驻泰全权公使任内，被伪满洲国授以二级柱国勋章。1943年上半年，郑禹仅以伪满的火碱20吨换回泰国大米3000吨，运到大连港，供日本关东军和其他日本人食用。此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7月7日，塞班岛失陷，日军防守部队全军覆没。10月20日，美军在莱特岛登陆，海上运输被美英等盟军封锁，泰国的物资已不能外运。10月后，美英等盟国飞机不断袭击曼谷。有一次，郑禹的住处被

炸毁，幸亏这时他带领眷属及使馆人员逃到海边避住，没有被炸死。后来局势越来越严重，郑禹于1944年8月奉调离开曼谷。

(四)

1944年8月，郑禹奉调由曼谷返回伪满洲国。他同家眷分两批乘飞机飞抵台北，再改乘飞机飞抵上海，又改乘火车经南京回到北京小住，便返回新京，就任伪满洲国恩赏局局长。他同伪满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司共同负责给伪满官吏续勋或确定升级。续勋有锦云章、柱国章，更高级别的是龙光勋章、兰花勋章。

这期间，郑禹常回北京。北京在日伪统治下百业凋敝，货物匮乏，物价暴涨，黑市横行，民不聊生。郑禹的胞弟郑何、已故胞兄郑垂的遗孀和过继的侄子，生活处境日趋窘迫，遂决计将郑家西直门大街的楼房卖了，各自买小四合院一处居住，余款维持生活。当然，经济发生困难的只是郑禹的胞弟和寡嫂母子，郑禹一家自然是肚满肠肥，金玉满堂。

郑家的房产共卖了1800余万元联银券。按三份半分，郑禹的寡嫂母子分得一份半，郑禹郑何各得一份。郑禹买了王府井小甜水井沟沿3号一处住房，郑何买了宣内南闹市口38号一处住房，郑禹的寡嫂在西单宏庙胡同39号买了一处住房。从此，郑家算是分了家。郑禹再也不感到受弟弟、寡嫂的牵累了。他同妻子、两个女儿居住在伪新京。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郑禹正在大连看望上一年由日本疏散回来在大连商业专门学校就读的三儿子郑颖达。他惊闻苏军进军东北，疾返新京，领得5万元疏散费，于8月11日携妻女随溥仪及各大臣们去通化。8月18日，溥仪举行“退位式”，伪满洲国覆灭，郑禹携妻女同伪大臣们又返回长春。8月

21日，苏军进驻长春，郑禹携妻女避住仁慈堂天主教修道院。此后，又辗转避居于长春、沈阳、天津、北京等地，1954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我当了十三年的伪满官吏

袁庆清

我于1932年6月充任伪满参议府秘书局秘书官。伪参议府的组织，是由正（张景惠）副（日人筑紫雄七）议长与参议为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办公计，下设秘书局。有局长（日人荒井静雄）、理事官、事务官各1人，均为日人。局内有秘书官8人，日人4名，中国人4名，我是其中之一。参议府的职权是以备溥仪咨询的机关，是审议伪满政权的重要法令与人事安插的机关。每周举行例会，由国务会议通过的一切重要政令由参议府会议通过后才算完成手续。

1934年，伪满实行新省制划分时，伪国务院人事处以为我有地方行政经验，派我出任新划省的厅长，于是我于1934年12月到伪间岛省公署任教育厅长。

间岛省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最难治理。我到任时，厅的机构是由日、中、朝族人组成，而朝族人尤其多。厅内共分两科，文教科和社会科。文教科分管文化教育，社会科分管宗教团体，义仓赈给事宜。间岛省的教育情况是：只有中等学校5所，初高级小学200余所，一切设施都异常简陋。1936年，随着日本对伪满治外法权的撤废，又收回朝族私立中小学计130余所，增设省立新式农科中学1所，扩充了省立师范和工